

Yanan Wenxue Tizhi De Shengcheng Yu Cexing De Shanbian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青年项目

延安文学体制的生成 与个性的嬗变

张根柱 付道磊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Press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青年项目

延安文学体制的生成 与个性的嬗变

张根柱 付道磊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山东省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的主要成果。全书共分为六章,主要内容是研究延安文学体制的形成、演变及由此带给延安作家、延安文学的影响。书稿结构紧凑,语言精练,文风朴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安文学体制的生成与个性的嬗变/张根柱,付道磊著.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5646-0104-1

I. 延… II. ①张…②付…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延安市 IV. I209.9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6049 号

书 名 延安文学体制的生成与个性的嬗变

著 者 张根柱 付道磊

责任编辑 孙 浩 齐 畅

责任校对 陈振斌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徐州市中国矿业大学内 邮政编码 221008)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排 版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排版中心

印 刷 徐州中矿大印发科技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57 千字

版次印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

编 委 会

主任委员 李 群

副主任委员 张全新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兆成 尹慧敏 齐 涛

刘德龙 安世银 张 华

蒿 峰 颜世元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张闻天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延安文艺 指导思想的过渡	5
第一节 张闻天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的 延安文艺	6
第二节 张闻天的文艺思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前延安文艺的指导思想	24
第二章 徘徊在战争的边缘	44
第一节 体验生活的下乡入伍运动	44
第二节 写什么与怎么写	57
第三章 战时的文化思想与文艺批评	78
第一节 战时文化的特征	78
第二节 文化上的苏联模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81
第三节 作为偶像的高尔基与作为旗帜的鲁迅	97
第四节 民族形式与文艺大众化	114
第四章 自由的文化界与独立的文化人	129
第一节 丁玲:延安文坛的航标作家	129

第二节 周扬、周立波与鲁迅艺术文学院的 “关门提高”.....	149
第三节 “演大戏”与“讽刺画展”.....	169
第四节 萧军:鲁迅文艺思想的传播者与实践者	182
第五章 文艺整风与个性的嬗变.....	195
第一节 从一场论争说起.....	195
第二节 整风中的延安文人.....	202
第三节 延安文艺界对王实味的批判.....	214
第六章 下乡运动与文学创作.....	220
第一节 不一样的下乡.....	220
第二节 文学创作与政策的互文性.....	233
结 语.....	253
附 录.....	254
主要参考文献.....	305
后 记.....	310

绪 言

1937年卢沟桥事变,揭开了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随着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相继失守,大批知识分子纷纷涌入内地,出现了文化中心由沿海向内地转移的趋势,进步的新文艺与落后农村地区的接触进一步扩大与深化。

从“九一八”事变日军侵略东北三省起,中国共产党就一直表现出积极抗日的姿态。与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相比,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民族解放与复兴的希望。1937年1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进驻延安,从此,这个坐落在中国西北角落的古城,遂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圣地。到延安去的这个目的,把全国各地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满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冒着生命危险,经过种种盘查,不远千里来到延安。据资料统计,仅1938年5月至8月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经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去延安的青年就达2280人。到1943年底,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已达40000余人。^①这些源源不断地奔赴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大都经过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洗礼,他们的到来,给延安这座古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活力。延安也深知知识分子在民族抗战与民族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对于知识分子的艺术创作与

^① 郭戈奇:《南洋的文艺运动》,载《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4页;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

学术研究,表现出了宽广的胸怀与远大的眼光。1941年6月7日、6月10日,《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奖励自由研究》与《欢迎科学艺术人才》。前者指出,人类历史上的前进运动,常常和思想自由的开展是分不开的。古今中外,每当革命处在转变的伟大时代,常常伴随着一个文化上的启蒙运动。开展自由研究,打倒不合时代的因袭权威,驳斥现实中的黑暗事物,启发新时代所要求的思想意识,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共同需要。在今天伟大的斗争中,需要各方面的知识,因此必须一方面积极地号召各种专家及知识分子,帮助和鼓励他们从事深刻精密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必须提倡勇于追求真理而不顾忌一切因袭教条的作风,提倡自由独立的研究作风。后者在对科学艺术人才表明了延安真诚的欢迎态度之后,更是向作家、艺术家发出了热情洋溢的呼唤:“深入到边区里面去吧,深入到民众中间去吧,涌现在你眼前的将会是无限丰富而生动的形象,许多新奇的生活的故事,战争的故事,不用歌颂,只需忠实地写出来,就会是动人的,富于教育意义的。对于边区的缺点(即是任何新社会亦所不免的),也正是需要从艺术方面得到反映和指摘。我们看重‘自我批评’,尤其珍视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气’。”^①与保守、专制的重庆相比,延安成为光明、自由、进步的象征,充满着朝气蓬勃的气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正是这批“外来型”知识分子中间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延安作家群。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既包括一些当时已响誉全国文坛的知名作家,如丁玲、艾青、何其芳、萧军等,也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文学爱好者。在这新的历史时期,他们一方面要负荷起抗战救国的时代重任,一方面又要把五四文学的精神火炬传承下去,在求得民族解放的同时,把五四文学中“人的解放”的主题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新文学在延安这块现代

^① 《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载《解放日报》1941年6月10日。

思想相对贫瘠、薄弱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能否实现这一历史要求,对于每一位居住在延安的现代作家来说,都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与北平、上海、重庆等深受新文化影响的城市相比,延安及其周围农村的文化环境对新文学的发展有着更为不利的一面。不要说科学、民主等现代思想鲜为人知,就是普通人的文化教育程度也惊人的落后。在华池,四五百人中间难于找到一个识字的,而在环县整个地区,也只有两个人受过中学教育,统治大多数人头脑的依然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①巨大的文化落差表明,以科学、民主为根基的现代思想与保守、落后的封建思想必然或早或晚地发生一次深层次的大碰撞。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与新文化力量的相对薄弱,这次碰撞所产生的结果让人感到不那么乐观。我们所要关心的是:在这场力量悬殊的碰撞中,延安作家的精神世界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又将给予延安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怎样的影响?

延安文艺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壮大,它的每一步发展,都与这些外来型作家息息相关。大部分延安作家都经历过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也接受过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洗礼。在这里,作家们度过了也许是他们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期。时代的风风雨雨在他们的心中刻下了难以抹去的印痕,也在作品中留下了他们艰难跋涉的足迹。为了延安文艺的发展,他们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生命乃至灵魂。一部延安文艺发展史,既是延安作家乃至整个延安知识群体的青春奋斗史,又是他们的心灵变迁史。面对这样一个个鲜活的灵魂,我们没有任何回避的理由。

^① 艾思奇:《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一九四〇年一月六日在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中国文化》第1卷第2期,1940年4月15日。

对延安文学发展道路和延安作家的生存状态与创作活动进行认真的考察、分析,揭示出延安文学、延安风貌和作家内心世界的精神变化,进而把延安作家群视为整个延安现代知识分子的缩影,描绘出发生在他们内心深处的精神巨变,这既是本文的总体构想,也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第一章 张闻天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延安文艺指导思想的过渡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政治生活中,还是在中国新文学史及文艺思潮史上,我们都强调一条历史发展主线,即强调这条历史发展主线的正确性、正统性和权威性。在延安文艺的研究上,人们普遍强调在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延安文艺所取得的成就,却相对忽视了在此之前延安文艺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甚至有些同志还将此前的文艺作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对立面。产生这种现象是有其客观原因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中国共产党指导文化、文艺发展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前张闻天所主持制定的教育方针、文艺政策有诸多不一致之处。在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不久,当时的延安思想界、教育界、文艺界即展开了对前期工作的反省、批评。这既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保持了高度一致,同时这种评价也一直延续到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然而这种对于延安文艺成绩的论断是不符合延安文艺发展的史实的。例如: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延安文艺丛书》,其中《文艺理论卷》中所收的文章,除了领导人的发言、讲话以外,书中大部分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都是发表在《讲话》之前。这应该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讲话》之后,整个文艺界都是一种声音了,文艺界进入了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实施和操作阶段,还哪来的对于文学理论的探讨和商榷的文章呢?

还是让我们重温那段交织着血与火的辉煌的文学历史,来看

看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后，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被安排辗转到了延安，一些激进的文化人怀抱救国救民的理想也纷纷奔赴延安。于是，在陕北，各种文艺机构、文化团体纷纷建立，文艺阵容也初具规模。在这里，激进的文化人如同到了家一样，他们的文艺思想十分活跃，对于延安的未来和文化建设充满了种种设想，他们之间不同的文艺观点可以自由论争、互相批评。这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文化艺术建设的良好开端！

第一节 张闻天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前的延安文艺

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经过缜密的考察，笔者认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延安文坛的创作与批评之所以空前繁荣，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张闻天对于文艺的正确指导是密不可分的。

下面主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对于文艺界的具体指导和原始史料出发，依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实证说明：在《讲话》之前，以张闻天为代表的文艺思想是党对延安文艺的主要指导思想。

一、历史的回溯：从上海到中央苏区

将这一段历史放在 20 世纪新文学整个发展史中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延安文艺的发生与发展，与整个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是割裂不开的：《讲话》前的延安文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内在的精神关联，《讲话》后延安文艺的发展与上海“左翼”文学有着相似的精神取向。

张闻天既是“五四”文学革命的老战士，又是上海“左翼”文学发展的转折点上的指导者，也是中央苏区文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与整个进步文艺界有着浓厚的渊缘，可以说，他的这种纵跨几个

历史时期的文学经验是当时党的高层领导者中无人能比的。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南京方面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①。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领导的、无产阶级进行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队，所以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与文学革命、社会革命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的陈独秀、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的李大钊与文学革命、社会革命的关系且不说，他们的历史初创的功绩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就是早期的其他共产党人恽代英、肖楚女、沈泽民、瞿秋白、周恩来、陈毅等，也都是以文学来作为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的武器的。而在早期进行文学活动的共产党人中，尤以张闻天最为典型、最富有代表性。张闻天从1919年投入文学革命至1925年，无论在文学创作、文学评论，还是在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方面，他都站到了文学革命的前列，作出了独具特色的创造与积极的贡献。他是经由文学革命之路，才走上了社会革命的道路的。

在建国以来的新文学史研究中，却长期地忽视了张闻天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热情战士在创作、翻译、理论上的成绩，也没有注意到张闻天从30年代初到40年代初作为新文学运动指导者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贡献。在30年代，张闻天在指导文艺方面就有着卓有成效的实践。他在上海时期对左翼文艺运动的贡献，主要是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32年11月，张闻天出面纠正了上海左翼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

1932年，在上海文艺界关于文艺性质与文学大众化等问题的讨论中，张闻天敏锐地“看到在我们的同志中间所存在着的非常严重的‘左’的关门主义”。这种“左”的关门主义，是“使左翼文艺运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载《斯诺文集》第2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书的范围内的最大的障碍物”，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一直没有发展起来的原因。而在文艺论战中，我们党在文艺战线上的几位领导同志却根本否认“第三种人”的存在，认为“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①，甚至把他们当成敌人。针对这种“左”的宗派主义的观点和理论上的机械论，张闻天认为“这种关门主义不克服，我们绝没法子使左翼文艺运动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②。于是，他化名“歌特”，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报《斗争》（一种油印的32开本秘密刊物，张闻天主编）第30期上，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

我们之所以要反思这一段历史，就是因为这篇文章代表着张闻天对于党领导文艺的方法与策略的积极的思考。他的这种开放的思想一直贯彻到他领导延安文艺的实践中去。

在这份党的文艺政策方面的珍贵的历史文献里，张闻天从整个文艺发展与对革命事业的利弊的角度，指出了这种关门主义主要有两种极左表现：

“第一，表现在对‘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否认。我们的几个领导同志，认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是无产阶级的，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其中不能有中间，即所谓第三种文学。这当然是非常错误的极左的观点。因为在中国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文学之外，显然还存在着其他阶级的文学，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而同时又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这种文学不但存在着，而且是中国目前

① 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载《瞿秋白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7页。

② 歌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原载党中央机关报《斗争》（上海）第30期，参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革命文学中最占优势的一种(甚至那些自称无产阶级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也还是属于这类文学的范围)。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些文学家,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这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使幼稚到万分的无产阶级文学处于孤立,削弱了同真正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做坚决斗争的力量。”^①

所以,“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们对于他们的任务,不是排斥,不是谩骂,而是忍耐的解释、说服与争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对于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实现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②。

“第二,表现在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的理论。照这种‘理论’看来,凡不愿做无产阶级煽动家的文学家,就只能去做资产阶级的走狗。这种观点,显然把文学的范围大大的缩小了,显然大大的束缚了文学家的‘自由’。”^③

张闻天认为:在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中间,有不少文学家固然不愿做无产阶级的“煽动工具”,但是他们同时也不愿意做资产阶级的“煽动工具”或“政治的留声机”,他们愿意“真实的”、“自由的”创造一些“艺术的作品”。况且,“在‘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中固然有文艺的作品,然而绝不是一切宣传鼓动的作品都是文艺的作品。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文艺作品都有阶级性,但绝不是每一文艺作品都是这一阶级利益的宣传鼓动的作品。”^④他进而用托尔斯泰的作品为例,说明“甚至许多文艺作品的价值,并不是因为它们是某一阶级的宣传鼓动品,而只是因为它们描写了某

① 歌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原载党中央机关报《斗争》(上海)第30期,参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同①。

③ 同①。

④ 同①。

一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现象。”^①所以,对于那些不是无产阶级的,但揭破了现社会的矛盾、描写了小资产阶级的没落的、有价值的文艺作品,我们的文艺批评家也应该正确地指出这些作品的阶级性与它们的艺术价值(或无价值),而不是把一切这些作品因为它们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品,就一概抛到垃圾堆里,去痛骂这些作品的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对于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对于不能像我们一样做的文艺家,我们都应该爱护,应该给他们以“自由”,因为事实上我们也没有法子强迫他们像我们一样地去做。我们的任务是教育他们,领导他们,把他们团结在我们的周围,而不是把他们从我们这里推开去。

此外,张闻天对于“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发表了独特的、辩证的看法。他说文艺应该大众化,左翼文艺家为了要实现宣传鼓动的目的,应该采取各种通俗的大众文艺的形式,通俗的白话文,写出能为大家所了解的文艺作品,这完全是正确的。然而因此认为只有这种作品才是文艺作品,只有利用这种“有头有脑”的说部、唱本、连环图画之类的形式才能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文艺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他认为无论如何,现代文艺的各种形式比较中国旧文艺的形式是进步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当然应该利用这种新的形式。并且,绝不是只有宣传鼓动的通俗作品,才是无产阶级的文艺,而且事实上这种作品的大多数并不是文艺作品。显然,张闻天对文艺的新形式(民族形式)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②

张闻天的反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意见,经由与他保持单线联系的左联文委书记冯雪峰的传达,在客观上促成了这次论辩的结束。它不仅在当时及时地纠正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偏差,联

① 歌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原载党中央机关报《斗争》(上海)第30期,参见《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同①。

合了“同路人”，而且对中国新文学发展中革命文艺一直存在的“左”的文艺思潮也是一个有力的警醒。这说明他作为党的文艺领导者已经有了比较系统、深刻的理论。虽然有许多观点，他尚没有充分地展开论述，但显然已是他思考的关注点。同较“左”的瞿秋白相比，其理论主张与领导方式也更讲究策略，更适合文艺界的特点，为他以后指导延安文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张闻天及毛泽东对 1942 年前延安文艺的具体指导

（一）从张闻天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考察其领导延安文艺之可能

在有些人看来，张闻天是在党的历史上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的人，他对于党和革命事业没有多少贡献，这是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及部分历史研究者长期地突显与淡化部分历史的结果。张闻天在长征途中即与执行王明路线的博古发生原则分歧，在遵义会议这个历史转折关头，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以及党与军队的许多领导同志一道，同党中央错误领导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发挥了别人无法取代的重大作用。正因为如此，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被推举为党中央书记，在党内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有力地支持、密切地配合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工作，成为党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这种情况大约一直持续到 1941 年秋季，据胡乔木回忆：“从一九四一年起，我被调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之一。大约就在这年秋季，闻天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召集人和中央宣传部长了。”^①

1937 年 11 月，王明回到延安后与党中央闹独立性，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张闻天同毛泽东一起在中央内部进行了必要的斗争。1938 年 7 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

^① 胡乔木：《回忆张闻天同志》，载《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版，第 17 页。